

-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成果

西方现代主义诗学 在中国

黄 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成果



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

XIFANG XIANDAIZHUYI SHIXUE ZAI ZHONGGUO

黄 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黄晖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5004-7281-0

I. 西… II. 黄… III. 现代主义—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5177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2

字 数 249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硕士生王惟甦教授、徐放鸣教授

我的博士生导师方汉文教授

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殷企平教授

理论体系创造：中国与世界 比较文学的对话

(代序)

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方汉文

昔人论学曰：自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自史学入小学者，其小学可信。余信之矣。其学术之研究，无非清人所谈义理、辞章与考据三者也。而义理者主乎经学，辞章主乎文学，考据主乎史学与小学，固三者缺一不可，然区别畛分，各有其职是也。

余素治学主张以经学为目，以辞章为纲，以考据为根底，得以成学术之大厦。经学者，即理论也，小学是为昔日之训诂文字之学，而于今日犹语言学与文献学。以此为依据，当代之学术，必须有理论、有文献考据与文学语言之研究，故中西语言文字为基础，可以成学矣。

20世纪末期，余自美国游学归来，适江南定居于姑苏城，执教苏州大学，长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招收博士研究生。黄晖从余游学三年，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越五年，示所著《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余因之为嚆矢，放眼国内外学术，不拘一题。

一、中国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创造

什么是中国对于比较文学这一国际性学科的独特贡献？

当前极为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中国文化代表了东方文化与文学，所以中国加入比较文学研究就代表了东西方对话。笔者认为，这种说法难以服人，比较文学是世界多种文明与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必然有多种文明文化与民族参加，否则就不是比较文学。事实上，无论是印度或是日本早已经作为东方民族在这一学科里与西方对话，在这方面，中国并不是先行者，我们也没有必要将中国作为东方民族的唯一代表来标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

另一种曾经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比较文学界相当流行并且影响波及中国大陆的看法是，中国用西方理论阐释了中国文学，称之为“阐发研究”，这是中国比较文学的贡献。笔者认为，这种观念同样无法立足，如果中国比较文学的意义只在于阐发西方理论，那么这种研究充其量不过是西方理论的映象，与现实相隔三重。其实最有讽刺意味的是，赛义德等人则早已经以后殖民主义批评了西方理论，指其为西方中心主义，我们何苦要成为西方理论的殉葬品呢？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已经过时的“阐发论”竟然还引起了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的不满，讥之为“地方主义”的产物，对汉学家们大加挞伐。^①

这正所谓“刘郎已恨蓬山远，犹隔蓬山一万重”。

^① Yingjin Zhang (ed.), *China in a Polycentric World: Essays in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

笔者以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 20 余年来,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我们首先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创造,并且初步建立了一种具有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与形态论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涵盖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特性,有一定的普适性,并且有自己的逻辑基础与独特话语,从而使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是欧美与其他国家的学者所不曾有过的。

1999 年,笔者首先撰文在《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上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创造的目标,继而在 2002 年在《比较文学高等原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比较文化学》等著作中建立了系统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学的学科理论体系,这是英美学者曾经想过但是没有达到的目标。早在 20 世纪中期,美国学者韦勒克在其《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有过创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想法,可惜的是并未见到他的实际行动。以后多年来,比较文学学科曾经一度迅猛发展,一派繁荣。但是毋庸讳言,这种繁荣之下隐藏着危机,危机就是缺乏学科理论体系的创造。所以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出现明显的衰退,主要表现为:第一是学科范围不明,什么是比较文学研究对象和中心不明确,特别是研究中心不明。近年来文化研究、翻译研究、西方文学批评等其他独立研究领域被拉进比较文学。同时,原有的“外国文学研究”或是“世界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改头换面出现于比较文学之中,比较文学的刊物与论文和外国文学界限模糊。第二是理论观念不明确,各种思潮在这里跑马,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在这里泛滥。尤其是近年的比较文学研究中,西方后现代理论的译介成为主要内容。第三是学科认识论与方法论不确定,比较文学教材成为西方后文学理论的后花园,重复早已经过时的西方阐释学、新批评、精神分析等内容。第四是研究模式陈

旧而且内容浮浅，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比较时，蹈袭中国文学与外国学者的旧论，拼凑成章，对于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而言均无贡献。

究其原因，由于缺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创造，没有独立的理论体系，世界学术史上，无数学科因为缺乏理论体系建构而消亡或是夭折，其实正是前车之鉴。

所以我们必须指出，20世纪末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继欧洲与美国之后，能开创世界比较文学的新阶段，其标志是以学科理论体系创造为代表，在多元文化的时代，只有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以多元文化的同与异为逻辑基础的体系，才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体系，被东方与西方所共同接受。

二、理论体系的“大厦”

毋庸讳言，“理论体系”一词在中国曾经长期声名不佳，甚至备受指责，其中原委笔者在相关论著中已经多次分析，兹不再赘述，只是就理论体系建构的意义与价值作一申辩。

黑格尔关于体系曾经说过：

知识只有作为科学或体系才是现实的，才可以被陈述出来；而且一个所谓哲学原理或原则，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个原理或原则，它就已经是假的了；要反驳它也就很容易。^①

理论体系是相对于学科而言的，体系建构的背景是本学科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页。

现实,当然,它并不只是原理或原则,但是它的最重要内容恰恰正是原理与原则,正是确立了原理,才可能使研究从现象进入本质,所以体系的建构是有现实意义与历史作用的。黑格尔以理论体系建构著称,也因此遭到非难,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就黑格尔体系曾经指出:

当然,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不得不求助于强制性的结构,这些结构直到现在还引起他的渺小的敌人如此可怕的喊叫。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珍宝。^①

恩格斯明显肯定黑格尔理论体系的价值,当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理论体系不是一种概念化的产物,它不是一两个概念所能代表的,也不是一种标志或是旗帜,它的目的是解决学科发展中的系统构成问题。因此,把某一种理论体系简单化是不妥的,比如,比较文学的定义就只是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方面,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仅有一个比较文学的定义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相当多的学者主张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要看到,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不是一种牌照,它至少应当是对一种理论观点的肯定,如同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的名称一样,是关于比较文学基本问题的新观念。从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说,创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真正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派,但是这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5页。

种学派并不排斥其他民族文化，而是以“同与异俱于一”的精神，兼收并蓄。创造一种学派不是最终目的，发展学科理论更为重要，而致力于学科理论的创造至关重要。

其次，否定理论体系的一些观点也是难以获得承认的，近年来有人喜欢引用钱锺书先生关于理论体系的一段名言来批评理论体系。钱先生是这样说的：

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经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利用的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①

其实笔者认为，钱锺书先生这里丝毫没有反对理论体系建构的意思，只是强调不能因为重视理论体系而忽视“片段思想”。从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来看，中国并非只有所谓的“片段思想”，更不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只有感悟性批评。孔子诗论、孟子与荀子关于诗的理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曹丕的《典论·论文》等，一直到清代叶燮的《原诗》，在思想史领域里更是如此，孔孟老庄，周朱陆王，体系的建构从未停止。只不过中国的理论亦有自己的特色，就是系统理论与语类语录并存，相互辉映，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并不是中国没有理论体系创造的证明。

① 钱锺书：《读〈拉奥孔〉》，引自张隆溪、温儒敏选编《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在一定程度上，庞大的建筑的木石砖瓦可以利用，正是由于其毕竟是伟大建筑的材料，如果没有“庞大建筑”，就连木石砖瓦都没有，只有一坯泥土，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一些“片段思想”能有“价值”，也正因为它们是理论系统的产物，如果它们不是理论系统的“见解”，也就失去了价值，正如钱先生所说可能早已随风而去了，这难道不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所以默存先生正是强调了体系并不是永恒的，也说明了体系即使被否定，其影响并不会随之完全消亡，《管锥编》与《谈艺录》等著作中引经据典，杂涉别集专著，但仍然是以六经诸子百家等中国文化的系统学说为依据与来源的。晋范甯序《穀梁传》曰“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云云，就是批评时人抛弃理论传统率尔操觚的毛病。扬子《法言·学行卷》曰，“川有渚，山有岳，高而大者，众人所不能逾也”，以高山大川比喻重要的学说理论，可见对其重视。

并非所有理论体系全都要消亡，中国六经与诸子、汉儒与宋明理学，包括佛学思想、圣经、古希腊哲学、欧洲近代哲学直至今日都有巨大影响。即使有所谓体系理论的消亡，其实只是体系理论进化与发展的一种方式，理论体系是通过除旧布新来实现的，如果没有一种理论是永恒的一样，也没有一种理论是完全消亡的，所有的理论都会在历史上存在，而且会在今天继续与我们对话。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已经说得极明白。我这里再引用黑格尔的一段话来说明它：

每当说到推翻一个哲学体系时，总是常常被认为只有抽象的否定的意义，以为那被推翻的哲学已经毫无效用，被置诸一旁，而根本完结了。……虽然我们应当承认，一切哲学都曾被推翻了，但是我们同时也须坚持，没有一个哲学是被

推翻了的，甚或没有一个哲学是可以推翻的。这有两方面的解释：第一，每一值得享受哲学的名义的哲学，一般都以理念为内容；第二，每一哲学体系均可看作是表示理念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或特殊环节。因此所谓推翻一个哲学，意思只是指超出了那一哲学的限制，并将那一哲学的特定原则降为较完备的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罢了。^①

理论体系被推翻并不意味着它的消亡，春秋诸子、《文心雕龙》等理论体系早已经过时，其原理也早已经被“推翻”了。但正因为吸收了它们，我们今天的理论体系才更加丰富。事实上，一粒麦子种入地下，它死亡了，但是会长出更多的麦子，这是前人所说过无数次的道理，我们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理论主线的发展不是单一的，它有一个巨大的语境（context），对于新世纪的中国理论界而言，正在到来的是一个理论探索潮流，超越文学、历史、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各领域，如季羨林关于中印关系史、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乐黛云、汤一介等在哲学与文学中关于跨文化对话的研究；钱中文文学理论中的“新理性精神”的倡导，等等，共同推动了理论创新，如上所述，理论建立过程中必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如大厦建筑中有碍观瞻的脚手架，其粗糙与不雅是怵目的，同时毋庸讳言，不同学说之间的互为抵牾也是存在的，笔者从不回避这种碰撞，而且相信这种冲突是积极的，是发展的必经之途。笔者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对象、主要理论构架如本体论、方法论方面都与一些学者有不同见解。但这种不同见解不是互相攻讦的理由，却正是互相商榷，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动力。

①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1页。

三、理论建构的前提：文化逻辑

英国作家吉卜林曾经断言：东西方与西方，永远不会相逢，表达了一种西方中心的文化不通约论，这种观念至今仍有相当影响，后现代主义者福柯等人就持一种文化不通约的看法，因为他们相信，东西方文化之间有不同的文化逻辑与思维方式，这是阻碍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关键，双方不能互相理解。因此在构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之前，必须先讨论文化逻辑的相通性。

什么是文化逻辑？中国与西方在文化逻辑上又有什么不同？

笔者曾经指出：

中国文化中的辩证逻辑为我们提供了逻辑依据，从整体来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样是以理性精神为主导的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而不是西方学者所说的所谓“次文化”……简单说，中国辩证观念是《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观念，《墨经》“同异俱于一”的辩证逻辑为核心。^①

西方文化逻辑以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为中心，经过中世纪神学的理性化，至近代以来形成了逻各斯—理性中心的传统，理性中心就是以同一性为中心，以同一性否定差异性，以理性压抑感性，西方文学作为文化的构成部分，不可能摆脱这种逻辑的影

^① 方汉文：《文化认识论的逻辑基础》，《光明日报》2000年5月30日B1版。

响。相反，中国文化精神是在墨经逻辑与孔子中庸之道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墨经逻辑中的同与异之间的互相联系与互相转化的观念，其实为中国文化提供了宝贵的逻辑与理性思维模式，使得中国文化充溢着理性与感性、自然与人类、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融合精神。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逻辑并非自始就处于绝对对立中的，西方也曾有过辩证逻辑的早期形态，有过同一性和差异性互相联系的思想，这种思想与中国墨经逻辑是相通的。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浩恩·骚西（Haun Saussy）在《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2006）一书中曾经引用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事物的差异存在于自身之中”，古代希腊人的这种观念其实正可以作为墨经中“同与异俱于一”之说的注释，证明中国与西方的古代哲学家们是所见略同。只不过在中世纪之后，神学家们将希腊哲学思想改造成了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基督教是一种一神教，其理论建立在上帝是唯一的思想基础上，神的唯一性化成为理性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自然成为文化认识论的中心观念。从此以后，一神论的基督教与西方的理性主义合流，形成了西方文化中以同一性中心而排斥差异性的文化逻辑，这种逻辑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发展到顶峰。黑格尔的逻辑学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说，以同一性（identity）作为文化的最高追求，其中心仍然是自我精神，与他人和自然之间的差异被否定和扬弃，差异被看成是感性的，是理性的对立面。

比较文学的兴起，一定意义上是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正是不同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差异引发了19世纪欧洲的比较主义，这种比较研究的目标最初只是理解世界不同文化中文学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最早的表现其实就是欧洲部分民族的文学影响溯源。20世纪中期之后，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批判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唯影

响论,倡导跨越学科与民族国家界限的研究,使世界比较文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是无可否认的贡献。但是毋庸讳言,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比较文学学者,都没有能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比较文学学科仍然没有文化逻辑,没有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正因为如此,比较文学处于“永恒的危机”之中。根本的原因在于:一种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差异性与同一性关系的学科,却被迫在西方文化逻辑的同一性轨迹上运行,这样的学科永远不可能摆脱同一性的制约,永远会有危机,这种危机存在于学科内部,这一学科的目标与其认识论和文化逻辑之间存在着对立,如果不改变其文化逻辑,这一学科永远不会有危机。

易经与墨经的逻辑,并不只是中国人的逻辑,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一种文化逻辑,它与古代希腊的辩证观念、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差异逻辑有一定相互参照之处,但是并不完全相同,只有把中国辩证逻辑与西方后现代差异逻辑结合起来,才能为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学科提供真正的辩证逻辑论。

四、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

明确了比较文学的文化逻辑之后,其思维与方法论的意义也就易于解决了。比较文学的方法论中,简单比附的方法备受指责,但是至今又不能改变。早在比较文学学科出现之初,就有学者提出,比较文学不能是“屈原比荷马、孔子比苏格拉底”式的牵强附会,简单比附。然而,时至今日,曹雪芹比莎士比亚、陶渊明比华兹华斯之类的比较仍然随处可见。由于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匮乏,这种简单比附在近年来比较文学研究中大有卷土重来之势。甚至比较文学学者也习以为常,学术界也把这种论文与论

著看成了比较文学的正统。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比较研究反而对于比较文学界的多数人是陌生的，甚至不知道是比较文学的论文，这种危机确实是存在的。

笔者认为，“成也比较，败也比较”。关键是对比比较方法的理解不正确。

与其说比较文学产生于比较方法，不如说比较文学产生于比较思维。比较，不只是一种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比较文学学科思维方式。

比较文学学科与19世纪欧洲比较主义思潮密切相关，与比较文学几乎同时产生了一批以比较来命名的学科，如比较解剖学、比较宗教学、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等等。但为什么会在这一时期产生这一思潮呢？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自全球航线开通以来，西方工业化国家实行海外殖民与海外扩张。这一历史过程本身是一种侵略，但是在客观上使得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产生接触与交流。西方人认识到异己文化的存在，从而形成了比较意识与比较思维。比较文学等比较主义学科中的比较方法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比较思维指导下的方法，是思维与方法的结合。

再从比较思维相关的字义来看，也是源远流长，“𡗗”在《说文》中的字形如同一个人背离众人，也就是在原来的“比”旁边加上人字偏旁。《说文》释作：“𡗗，别也。从人比声。诗曰：‘有女𡗗离。’”正如段玉裁注所说，其来源是《王风·中谷有蓷》，汉儒对于这首诗的解释是：“夫妇日以衰薄，凶年饥馑，室家相弃耳。”显然有牵强附会之处，但表达别离众人或家室的意思可以说没有理解错。当然也可以从民俗学或人类学角度来分析，如说成是原始民族女儿出嫁的“哭嫁曲”，这种风俗在很多地区都存在过，在中国西南地区还一直保持到现代。无论它产生

的文本语境是什么,它的语义是分明的。出走别离是它的本义,并且由此衍生出另一个重要意义——差别,即事物间的差异以及对于差异的辨识。《孝经》中所说的“上下有别”即是如此,《礼记·乐记序》“故群物皆别”注为“别,谓形体异也”。

基于对事物的差异性与同一性之间关系认识,人类进一步发展出逻辑思维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归纳是推理的重要形式,它就是起于比较,此即墨经中的“侔一比”:

《小取》: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

庄春波先生指出:

“侔”是齐、等。比肩而行为侔;比辞而生也为侔。“侔一比”之法取其等同为类。这种推理形式,是在原判断主项、宾项附加“侔”(齐等)辞,从而推出一个新的判断。这种形式的“侔”式推论,按其本质是演绎——分类法。它的复合形式是多辞相比而俱行。^①

正是在分类的基础上,才形成了逻辑的类比方法。万物有独特的存在形态,呈现出事物自身的差异性,它与事物的同一性互为辩证。物可齐亦不可齐,这便是庄子的“两行”之说,也是哈贝马斯所坚持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使得他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有所不同。我们认为比较观念是逐步完善起来的,从“匕”到“仳”与“比”,就可以看出这一发展过程。人类在认识中观察到

^① 庄春波:《墨学与思维方式的发展》,中国书店1997年版,第108页。